秦岭别墅如何成为另类“钉子户”

赵志疆

今日论语

据新华社报道,不久前,西安市拆除秦岭北麓41栋违建别墅的消息备受关注,新华社记者近日来到工地现场看到,部分原有别墅未拆除,多栋独立建筑已拔地而起。一名现场施工负责人员说,这块地已三次易主,因为建的别墅“结构不合理”、“卖不出去”,开发商接手后决定拆旧建新。一位知情村民透露,这一地块“现在没建别的,还是在造别墅”。

早从2003年起,我国已明令禁供别墅用地;2003年陕西省也曾对秦岭北麓的生态环境进行专项整治,禁止从事房地产开发建设、修建商品住宅和私人别墅;2007年陕西省政府又印发《陕西秦岭生态环境保护纲要》予以重申。然而,层层禁令,未能阻止“秦岭深处有别墅”拔地而起。面对社会舆论的口诛笔伐,违规别墅在西安市秦岭生态环境保护管委会办公室(以下简称秦岭保护办)监督下进行拆除,令人大跌眼镜的是,拆除不是为了生态复原,而是为了再建新别墅。

实际上,当初拆除违规别墅原本就留下了很多伏笔——关于拆除原因,秦岭保护办表示“占用绿地面积过大,建筑风格与山势不协调”,而不是违法违规修建;至于拆除之后的用途,秦岭保护办三缄其口。当违规别墅在巨大的舆论质疑声中死灰复燃,一切似乎更像是开发商自主进行的营销调整——“结构不合理”、“卖不出去”的烂尾楼终究是要处理的,但这样的出血割肉并非为了保护自然资源、尊重公共利益,充其量不过是以退为进牟取更多销售利润。无论谁来开发,无论如何拆建,被誉为“陕西绿肺”的秦岭北麓注定戳满违规别墅,面对这些另类的“钉子户”,不知当地主管部门心中作何感想?

秦岭保护办执法监督处处长刘兴让“肯定不会让他们建房地产,这也是将来审核的重点”的表态犹然在耳,新的别墅群已紧锣密鼓初具规模,监管的力度何其疲软?秦岭的违规别墅自2003年就开始修建,长达9年的时间内却未见监管部门出面叫停,甚至就在因媒体曝光而饱受质疑之际,秦岭保护办仍然极力辩解“这个项目手续齐全,也是政府保留的项目”。明显违规的项目如何“手续齐全”,“政府保留项目”为何推倒重建?如果违规别墅“结构合理”且“卖得很好”,会不会拆除重建?

公众之所以关注秦岭拆除违规别墅,是因为类似的别墅违建之举在各地“屡见不鲜”,尤其是一些私家别墅私搭乱建,更让公众不满。前两天,名模马艳丽别墅院内私建三层小楼,被邻居告上法庭;本市别墅违建的,也是经过一段时间的整治,才得以好转。如果不能以制度问责强力纠偏,即使名山大川,也难免被另类“钉子户”瓜分殆尽。

新民随笔

精确纪念

沈月明

香港7名保钓人士15日成功登上钓鱼岛,并插上五星红旗宣示主权。当天在微博上频频看到“今天也是抗战胜利纪念日”的表述,不由心生感慨。

准确地说,8月15日不能称为抗战胜利纪念日。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广播《终战诏书》,9月2日日本代表在密苏里号军舰上正式签字向盟军投降,次日中国举国欢庆。民主党派“九三学社”正是以纪念这个日子而命名。1951年8月13日,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发出由周恩来总理签署的通告,确定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为9月3日。9月3日作为抗战胜利纪念日显然更符合历史事实。

但时至今日,了解这一知识的人并不多,这与历史教材的不明确和国人对抗战历史的长期笼统认识有关。

关于抗日战争,我们有很多史料上的空白和模糊地带。比如关于南京大屠杀遇难者人数的调查,已然留下遗憾。虽然经过南京多所大学志愿者几年努力,但终因年代久远,加上很多幸存者已经过世,直到今天,刻上遇难者纪念墙的姓名仅有一万多个。细菌战受害者调查也因同样的原因遭遇重重困难。依据韩国最新发布的数据,韩国慰安妇幸存者仅剩60名,而我国则没有这方面的数字。

好在近年来政府和研究机构加大了对抗日战争研究的重视程度,很多历史事实浮出水面,一些过往模糊或不准确的观点得以重新厘清。纪念抗战胜利六十周年之际,国家决定向每位抗战老兵颁发勋章,很多已经被遗忘的老兵重获光荣。央视主持人崔永元发起的《我的抗战》口述实录抢救性工作成果卓著。最新的消息是,今年中央财政特别安排19亿元,支持25个省份完成30万座散葬烈士墓的迁建以及2000座零散烈士纪念设施的修缮工作,多少可能被湮没的抗战往事和英灵将不再孤寂。

重视抗战历史研究,保护抗战文物和遗迹,加强抗战历史的宣传教育,当然不仅仅是为了对否定战争罪行、推卸战争责任的人作出有力回击,更重要的,这是对战争受害者的尊重,对抗战英雄们的纪念,是我们这个民族对历史和对未来必须负起的责任。

崔永元曾说,我们的抗战口述历史影像资料,全国加起来不如日本早稻田大学一个学校。我们必须加快行动,因为留下的时间已经非常有限。

媒体视点

■ **人民日报**《城市规划要“目中有人”》:每个地方都有各自的自然条件,每个地方也都有自己的建筑历史、风俗习惯、风土人情和精神文化追求。只有立足当地实际,坚守为人服务,才能建设风格独异、符合当地人需要又具文化内涵和时代气息的现代化城市。 **(王皋子)**

■ **广州日报**《药品“黑名单”关键在被黑后的代价》:黑名单,不仅是让公众知道这些企业干过的坏事,让其声誉扫地,更重要的是,政府要通过惩罚让其感受到“这样的污点将永远背负”。 **(曹林)**

■ **新京报**《“梁祝故里”遇冷不是坏事》:不管是原来投资商的资金链条出现问题,还是现在无人问津,说明“梁祝故里”景区项目的吸引力根本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大。另一方面,全国那么多的名人故里,那么多的人造景区,可真正能实现盈利的能有几家? **(徐刚)**

观点圆桌

“男”改“女”,这么难?

新闻焦点:据郑州晚报报道,女医生黄晓燕2004年考取执业助理医师资格证,但河南省中医管理局误将持证人性别填成“男”。8年来,黄晓燕8次申请更改错误无果,而“变性”证书使她无法从医,只能卖药。

需有纠错机制

职能部门做事不可能十全十美,所以需要有快速的纠错机制,减少老百姓的麻烦,也增强政府公信力。可怕的是没有纠错机制,或者有机制却发动不起来。

王军荣

谁来承担责任

这8年中,改正错误的“壳”究竟卡在哪里,为什么卡住,该承担什么样的责任,以后如何改进服务,如何避免类似情况再次发生,都需要一个清晰的交代。

郭文婧

服务意识缺失

一些办事难的现象,并不是事情真的有多难,而是某些工作人员“主观犯难”。民本意识、责任意识、服务意识严重缺失,简单的事情也变成了难事。 **李英锋**

“夏令热线”是对韬奋精神的弘扬

新民网论

上海媒体的第一条为民服务的热线——新民晚报“夏令热线”开通整整20年了。新华社专门为此采写了一条报道,称赞这条热线搭建了政府与市民沟通的桥梁,坚持为民服务、为民分忧,得到了百姓信任。

还清晰地记得20年前,新民晚报与当时的上海市公用事业管理局合作,在炎炎暑天里开通了“夏令热线”。起先是新民晚报“单干”,后来开始和电视台合作;再后来,上海其他媒体也相继开办“夏令热线”,乃至“冬令热线”。职能部门也纷纷出动,与媒体同心协力。市民呼声得到及时回应,急事难事获得帮助,媒体与受众的关系,政府与市民的关系,官员与群众的关系愈加密切和谐。

新民晚报“夏令热线”问世20年,让我们想起了中国新闻界的楷模邹韬奋和“竭诚为读者服务”的韬奋精神。在新媒体、全媒体时代,采编手段、出版流程、受众心理、阅读习惯都会变,但韬奋精神不会过时,“夏令热线”正是这种精神的承继和弘扬。在新民晚报“夏令热线”20年之际,曾先后以副市长、市长身份6次来到“夏令热线”接听市民电话,与读者代表面对面的韩正市长,特意致信祝贺,并提出希望。可以相信,与韬奋精神一脉相承的“夏令热线”将保持为民服务的“恒温”,赢得上海市民更好的口碑。(吕怡然 全文刊新民网,网址 www.xinmin.cn)

查查鳄鱼的“娘家”

日前,在浦东长清路高清路桥河道中发现一条1.2米的暹罗鳄,这已是发现的第3条了。应该尽快查出鳄鱼的来源,不能以为击毙了,就可划上句号。 杜建国 画

校长搬椅子和处长训教授

王石川

自由谭

一说到清华校长梅贻琦的名言,人们自然想到他的那句“所谓大学者,非谓有大楼之谓也,有大师之谓也”。其实,梅贻琦还有一句有意思的名言,“校长不过是率领职工给教授搬搬椅子凳子的”。前一句话,是说大师之于大学的重要;后一句话,是说校长如何对待教授、对待大师。

“一个大学之所以为大学,全在于有没有好教授”,教授的水平往往决定着大学的水平,身为一校之长,有责任尊重教授、善待教授,服务好教授。不过不少大学的校长一般很忙,清华大学原校长顾秉林说:中国的大学校长可能是最累的校长。武汉理工大学原校长周祖德坦言,“做校长很‘心’苦”。华中理工大学原校长杨叔子更是抱怨:“校长不是‘人’当的。”校长为何如此之累和苦?管的事太多,承担的责任太大,因此也就没有时间没有精力给教授“搬椅子凳子”了。

日前,北京外国语大学新任校长韩震向全校师生公开承诺“三不”:担任校长期间,不再做专业学术研究,不再申请原有学科专业的研究课题,不再谋求与教学有关的个人荣誉。此前,湖南大学、北京师范大学校长在履职之初也做过类似承诺。这样,校长可以从繁杂的学术任务中解脱出来,专心于服务与管理高校,也摆脱了校长利用权力谋取学术福利的可能性。

其实,在一些发达国家,校长专职化早已形成了较为健全的制度常态。比如美国耶鲁大学第22任校长理查德·雷文,他在担任耶鲁大学校长12年的时间内,没有带过一个研究生、博士生,也没有挂名领衔做过一个具体的科研项目。在不少发达国家,由大学理事会(或董事会)负责的校长遴选委员会,在遴选校长时不是看此人的学术能力,而是更关注此人是否具有胜任校长的能力。

温总理说过,现在的教育确实存在许多问题:一是教育行政化的倾向需要改变,最好大学不要设立行政级别。二是让教育家办学。毋庸讳言,我国大学不缺校长,缺的是真正懂教育的教育家。一个教育家,必能把教授当做学校的主体,摆正自己的位置,梅贻琦就是一例。他曾把自己比喻成京戏里叫“王帽”的角色,看上去万人瞩目、前呼后拥,“其实会看戏的绝不注意这正中端坐的‘王帽’。他因为运气好,搭在一个好班子里,那么人家对这台戏叫好时,他亦觉得‘与有荣焉’而已。”

大学校长搬椅子凳子,当然只是比喻。无论是清华大学还是西南联大,皆大师云集、硕果显著,难道不正与梅贻琦等校长的作风有关吗?令人遗憾的是,在一些大学,教授见了处长都唯唯诺诺,处长训斥教授像训斥孩子一样,谁给谁搬凳子发生了严重错位。多一些给教授搬椅子凳子的校长,则教授有幸,大学有幸,使大学和学子受益,而校长也必能“与有荣焉”。